

与毛澤东論中國革命

與毛澤東論中國革命目次

前言

- 一 社會性質的荒謬
- 二 兩次革命的錯誤
- 三 政治制度的妄談
- 四 三民主義的曲解
- 五 文化意見的空虛

後語

附錄

給毛澤東的三封公開信

- 一 論行政系統及軍政統一問題
- 二 論三民主義的性質
- 三 論一黨政治與多黨政治

與毛澤東論中國革命

前言

毛澤東近來出版了一本小冊子，發表了一套意見，叫做「新民主主義論」。一月以前，我雖在書店裏看到，也未加理睬。因為「民主主義」本是他們常用的名詞，「新」字不過是引人注目的廣告，他們在出眼界慣於用這類響名來誘致青年，而那時我正在病中，也沒有精力來駁斥，當然是不理為好。

直到最近，在友人處重新看到，翻閱一下，覺得其中意見，實在詭譎太甚，對三民主義和孫中山先生的主張，不止作了一種很大的曲解，簡直是不可饒恕的污蔑，而且他對於我們近年來所闡揚的一次革命論也公然加以誣罵，拋來了挑戰的手套，於是我不被迫作戰。

毛君雖是中國共產黨裏面的頑固派，死死固守着他那套「馬列主義」的舊說，而不肯認真的「棄舊圖新」，却也曉得「科學的態度」是「實事求是」，決不是「自以為是」與「好為人師」那「狂妄的態度所能解決問題的」。並且「希望共同討論，得出正確結論，適合我們民族的需要」。他既然還把「民族的需要」放在腦海中，我方才發點心力來和他「共同討論」一下。『君子之過如日月蝕』

，改變過來就是好的」經過這次「毛君假如能「從抗戰教訓中發生覺悟而和大家一齊進步起來」。不再做「馬列主義」的守衛份子，豈非國家民族之大幸？

因此，我就直入本題，開始討論。

一 社會性質的謊謬

「新」與「舊」本來是相對的，無「新」固不能知「舊」，無「舊」亦不能翻「新」，毛君爲「要建立一個新中國」，使其「不但有新政治，新經濟，而且有新文化」，於是不得不找出當前應該「革除」的舊政治，舊經濟與舊文化來，以期得他所「要建立起來的，則是與此相反」。大「新」而特「新」的東西。他在找尋舊政治，舊經濟與舊文化的當中，談及了中國社會的性質，說「自周秦以來，中國是一個封建社會。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，其經濟是封建的經濟，而爲這種政治經濟反映的文化則是封建的文化」。這是他對過去社會的分析，和我們現實的關係較少，而且是一個歷史問題，研究起來也很麻煩，故暫不贅論。

近代呢？在毛君的眼中，中國是進步了，可是又落後了。進步的是它由全「封建社會」，減去了二分之一（一半）的「舊」成分，變成了「半封建社會」；落後的則是它從鴉片戰爭以後，受「外國

資本主義侵襲」，失去了獨立性，「逐漸變成了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」。因此，「現在的中國，在淪陷區域是殖民地社會，在非淪陷區域基本上也還是一個半殖民地社會；而不論淪陷區與非淪陷區，都是封建制度佔優勢的社會。這就是現時中國社會的性質，這就是現時中國的國情！」

真的嗎？我們且本著「科學的態度」，和毛君商討一番。首先要問的是：什麼叫封建社會？由它減去二分之一的成分，又是一個什麼光景？毛君站在唯物史觀的立場，一定贊成先從經濟方面考察起。王柯斯明斯基告訴我們：在西歐，封建社會完全發展的時期，經濟上是以世襲莊園的農業生產為基礎，政治上是特權等級和地方割據為特徵，文化上則是宗教的迷信居於統御地位。不折不扣的全封建社會。便是如此。

但，自鴉片戰爭以來，依毛君的統計，「中經太平天國運動，中法戰爭，中日戰爭，戊戌政變，辛亥革命，五四運動，五卅運動，北伐戰爭」，乃至把這明其妙的「土地革命，「一二九」運動」，「統通算在一起，「直到今天的抗日戰爭，這樣許多個別的階段，費去整整「一百年工夫」，已經「逐漸生長了資本主義的因素」，尤其是「在五四以後，中國生產了完全嶄新的文化生力軍，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人所領導的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，……以新的裝束與新的武器，聯合一切可能的同盟軍，擺開了自己的陣勢，向著帝國主義文化與封建文化展開了英勇的進攻」，更把中國的封建成分打去了一

準，可以叫做『半封建社會』了。這真難爲了我們這枝『究盡嶄新的文化能力』呀！

雖是如此，你不要以爲中國就沒有封建成分呵！『不論在淪陷區或非淪陷區，都是封建制度佔優勢的』。什麼理由呢？毛君沒有談及。封建成分與『資本主義的因素』比較起來，其所謂『佔優勢』究竟是幾分之幾，毛君也沒有談及。如此而叫做『半封建社會』，不是『無一點根據麼？』

的確，毛君對於中國社會的分析完全是信口開河。『直到今天，……也還沒有懂得中國的全部』。他不知中國在鴉片戰爭以前，固然是個封建社會，但已不及歐洲的封建社會來得典型，帶有變相的混雜的色彩。到鴉片戰爭以後，中間經過許多偉大的進步的歷史事變，封建制度不論是在經濟上、政治上或文化上，都受到嚴重的打擊，已被摧毀殆盡，連二分之一的成分也沒有了。

這些偉大的進步的歷史事變，並不是毛君說的中法戰爭、中日戰爭和什麼『土地革命』、『一二·九運動』，而只有太平天國運動、洋務運動、戊戌維新、辛亥革命、五四運動、國民革命、統一戰線，纔能列入，纔足以當。拿歐洲由封建到資本這一階段的歷史事變來比擬：太平天國運動用一神教的基督教代替多神教，可說是我們的宗教改革；洋務運動用機器工業代替手工業，可說是我們的工業革命；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用民主政治代替君主專制，可說是我們的民主革命；戊戌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用科學哲學代替封建思想，可說是我們的文藝復興和啓蒙運動；國民革命直接打倒軍閥，間接打

倒帝國主義，可說是我們的民族運動，統一戰爭消滅殘餘的割據勢力，鞏固國民政府的中央政權，則可說是我們的建國運動。這些都有其特殊的歷史意義，並且每經過一次，便可使中國離開中古一步，走上近現代一步。這實不獨為社會建國的動力。經此運動的革命過程，中國社會根本上已經資本主義化。這決不是對非階級非黨的中性封建社會。

事實發生在十九二七年，共產黨於其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對土地問題決議案中，這作過比較正確的分析。那時，它認為：「中國完全沒有封建式的地主經濟，只有封建勢力已成了『殘餘』，『資產階級式的土地所有制』已經佔着優勢」，而且「這種優勢日往發展」。「見『紅色文獻』一九八—二二八頁」。然而，事過十三年，直到現在，中國的「封建殘餘」內同上，不但沒有「肅清」，「封建制度反而佔優勢」了，這是什麼原因呢？是中國歷史的倒退嗎？

照唯物史觀判斷，中國在經濟基礎上既「完全沒有封建式的地主經濟」，而「資產階級式的土地所有制」已經佔着優勢，則與此相應的上層建築——政治和文化更應該不是封建的而是資本主義的了，為什麼毛君說它不僅政治是「半封建的政治」，文化也還是「半封建的文化」呢？這裏我有一次幾點要問毛君：

一、你們黨的決議案說「中國完全沒有封建式的地主經濟」，「『資產階級式的土地所有制』

度佔優勢」，「稱你脫中國」不聽在淪陷區與非淪陷區，都是封建制度佔優勢」，「其經濟是……半封建的經濟」，究竟誰是誰非？

「」在「封建制度佔優勢的社會」中，資本主義當然不該發達，「資產階級們在經濟上與政治上」固然「是異常軟弱的」，無產階級則尤其幼稚。照恩格斯的意見，「無產階級當時仍舊只是受痛苦的和被壓迫的群眾，沒有一切創見，不能獨立的政治行動」，「見」空想社會主義到科學社會主義」，自然談不上領導革命，為什麼你脫中國民主主義的革命反「不是舊的完全被資產階級領導的」……而是新的被無產階級領導或參加領導的」變？無產階級有此時代的領導能力，在馬克思主義上有什麼理論根據？

「」既然中國現在還是一個「封建制度佔優勢的社會」，則消滅封建勢力的工作自很必要，你們過去所進行的「土地革命」和「反封建」的作用，為什麼又與國人宜停止呢？

這些都是我們黨綱裏的問題，毛澤東願「共同討論」，則請明白答覆！

中國社會的性質並非如毛說的是一半封建半封建社會，或「封建制度佔優勢的社會」，我們也經過辯論與實踐，則「這」還是「半殖民地半封建地」的社會呢？照毛說的說法，「在淪陷區是殖民地社會」，在非淪陷區，基本上也還是一個半殖民地社會」。這就把整個中國變成兩半；「半

叫做「殖民地」，指其爲「附屬國」，不是公開承認日本統治的既成事實，甘心把它送給日本嗎？另一半叫做「半殖民地」，指的是一「非附屬國」。在這「非附屬國」裏面，毛君積極擁護蘇×，說「中國不站在這方面，就要站在那方面」，完全不能獨立，難道又準備把蘇×作「蘇×」的禮物嗎？所謂「半封建社會」的意義，就是這個樣子麼？

毛君拍拍胸脯，挺身而出，說道：不錯！「處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國際環境中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任何英雄好漢們，要就是站在帝國主義戰線，變爲世界反革命的一部分，要就是站在反帝國主義戰線，變爲世界革命的一部分，二者必居其一，其他的道路是沒有的」。讀者諸君！你看我們中國還有什麼辦法呢？毛君和我們算的「八字」，命運註定我們如果不做「殖民地」的奴隸，「變爲世界反革命的一部分」，那就要做「半殖民地」的苦役，「變爲世界革命的一部分」。「民族獨立」與「自力更生」的道路，完全是不可可能的。軌戰的結果原來如此，你看「他們準備置民族命運於何地？準備置其自身於何地？」

事實上，好在毛君所算的「八字」並不見得正確，我們還可本着「人定勝天」的原理放心做去，力求「自力更生」與「民族獨立」。因爲歷史告訴我們：在加富爾時代，意大利的復興，其困難更比中國還苦，它當時所處的國際環境，一方面是強悍的奧國，另一方面則是險峻的法國，兩邊都是帝國主義。

「國策」，並沒有一個「民族主義」的條碼。在國際之間謀算，而尋求對外發展，其源如非淵的，不站在這方面，就頭頭在那方面，終而一掃而空，用著通曉外交政策，難以法國為友，而法政果，却不做法國的一部分。結果經歷了度難苦難的過半，新的自相獨立意大利居然出現了。可見殖民地或半殖民地，二十世紀四十與五十年代的環境中心，要求得獨立，雖處於「帝國主義戰爭」與「反帝國主義戰爭」之期，只要有堅定正確的對外政策去聯絡友邦，並不見得定要外國所同化做別人的一部分。毛君替我們所算的「八字」，完全是武斷的說教，毫無根據。他之如此，「原來不為別的，專為百分之四十九與五十一，其用心亦良苦矣」！

我們知道：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，受到帝國主義不斷的侵襲，固然墮入了「半殖民地」的狀態；但我們也還是不斷地反抗，力求取得獨立的地位。因此，中國社會的性質，既不「能以「半殖民地」四字來決定，更不能以「殖民地」三字來形容。尤其是在抗戰已歷三年愈打愈強的現在，如果還有人認為中國社會是「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」，那簡直是「不識時勢的頑固的東亞」！

為甚麼呢？因為中國過去雖然是一個弱國，沒有日本強盛，軍事上毫無準備，但抗戰三年，却使日本陷於泥潭，進退不得，打了勝仗還想求和。這比起海關那種唯唯諾諾，以精銳的武器和德國作戰，不到兩月便失陷投降的情形來，固不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國策，堪與英美諸國並駕齊驅。事上，也是因為抗戰三年，不僅使中國的國際地位一天天地提高，為外國所重視。在法國未失陷之前，外國對於我

們的抗戰雖很同情，却不以爲和它們有什麼密切的利害關係；而在法國失敗之後，由於日本侵入安南，企圖南進，被我們的抗戰所牽制，無法自由行動。便證明中國的抗戰是世界反侵略戰爭中重要的一環，有其偉大的力量。要是沒有中國，侵略者的氣焰必然更見囂張。因此，英美諸國今天對中國的援助，更覺得是切身利害所關，爲同盟國家應盡的義務了。

這樣，只要抗戰一勝利，中國便成了頭等國家，一切不平等條約自然隨之廢除，自由獨立於世界。那是中國就和土耳其一樣復興起來，還有什麼「殖民地半殖民地」呢？抗戰之能得到勝利，不久即可實現「殖民地半殖民地」的狀態很快就會取消，毛君怎能以「現時中國的國情」，肯定「中國社會的性質」呢？

毛君有眉竊笑地答道：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與蘇聯已經完成社會主義建設之後，就決不會再有一個土耳其，尤其決不會有一個四萬萬五千萬人口的土耳其」。老實說：中國做「從殖民地半殖民地」的命運是上帝註定了的，縱使蘇×有侵吞中國的野心，自「口旁」們共產黨也要從裏面幹起來，設法投入蘇×的懷抱，使它「變爲世界革命的一部分」。

毛君分析中國社會性質的用意和結論。便是如此，我們明白以後，真可嘆觀止矣！

二 兩次革命的錯誤

馬克思社會主義的特徵，是要以資本主義的發達爲實行的基礎，中國在毛君的眼中，既是「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」，資本主義當然是極不發達。這樣，又怎能把它改造成爲社會主義的社會呢？

毛君說：不要緊！「很清楚的，中國現時社會的性質，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，它就決定了中國革命必須分爲兩個步驟：第一步，改變這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，使之變成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；第二步，使革命向前發展，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。中國現時的革命，是在做第一步；這個革命，按其社會性質說來，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，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革命；這個革命，現在還未完成，還須付與很大的氣力，……孫中山先生說：「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須努力」，就是指的這種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」。

這樣，把革命分成兩次，「其第一步是民主主義革命，其第二步『社會主義革命』的辦法，並不違背毛君個人的新發明，而是馬克思創立的「兩次革命論」。在這兩次革命論之內，毛君根據史太林的意見，「分爲若干的階段」，而在每一階段底下，「又分爲許多小段」，一步一步地革去，又可叫做「階段革命論」。

所以階段革命論是兩次革命論中間的一部分。俗話說：「擒賊先擒王」，我們要指出階段革命論

的錯誤，根本上還是應先批評兩次革命論。什麼叫做兩次革命論呢？這就是說：歐洲的歷史，在由封建社會進入共和社會，中間必須過資本社會的階段，而且由封建資本與由資本到共產的過程，都要發生一次革命。前者起於破壞封建社會的政治制度——君主專制，故不惟叫做政治革命，亦名民主革命；後者起於改變資本社會的經濟組織——私有財產制，故不惟叫做經濟革命，亦名社會革命。這種先由民主革命再到社會革命的意見，用一個術語來歸納，便是「兩次革命論」。

現在，世界上一般國家，大都經過了第一次革命——民主革命，只有第二次革命——社會革命還未完成。因此，社會革命不止是現實的課題，而且是兩次革命論的基礎。假如沒有社會革命，則由封建社會到共產社會之間，便無所謂兩次革命了。但社會革命之進行，必以資本主義的發達為前提。沒有資本主義的發達，一方面沒有實現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，另一方面沒有造成它的階級鬥爭。這是馬克思要把社會主義放在資本主義之後的原因。

中國在毛君的眼中，既是一個「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」，要實現社會主義，自然第一步要從事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」，「反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」，「建立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」。所以，他於二萬五千里長征之後，與其同志自動收起紅旗，不用「最後一滴血，無產階級」，「共產黨的歌詞」，而要「誠心誠意的」？「實行三民主義」？

在他看來，「現在抗戰的階段與戰後完膚時主張和平的階段，都是三民主義的階段，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性質的階段」，「是『新階段』」。這種階級達到兩結果，就是使中國由「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」變成一個「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」。這種「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」，就是資本主義的社會，也就是三民主義的社會。「三民主義則只有民主革命階段，沒有社會革命階段」。因此，它雖「爲今日」，「中國未必需要，本『共產黨』願爲其徹底的實現而奮鬥」，將來還得於它之外，再幹一次社會革命，纔能實現共產主義的理想。

這就是兩次革命論的本質與毛君移用於中國的原因，然則，他究竟對不對呢？不對！什麼理由？第一、他不知道兩次革命論適用的場合。因爲社會革命在歐美，是「我已經發達的結果」。當民主革命完成，政治上推翻了封建制度，樹立了民主政權以後，資產階級改造國家的目的已算達到，只須在經濟上自由發展就行了，並沒有注意如何發展的方式。因此，「資本家都是自利的經營事業，互相競爭，致生產陷於無政府狀態，造出了許多弊害。這些弊害，不但使他們自己遭受煩惱，尤其使無產階級最爲痛苦。它一經成了既成事實，也無法中途挽救，於是馬克思應其已然的機勢，主張無產階級再來一次社會革命，創造一個新的社會。這好比患痼疾的人一樣：事先既沒有預防，最初又不明白它的症候，等到一天一天地厲害了，不能中途使它消散，便只好讓其腐熟，施行手術，以求痊癒。

爲醫於已發的辦法。

孫中山先生說：「歐美改良政治之時，……生『資本主義的流弊——非』，彼以爲政治良百事皆良，遂不注意於社會事業，及至社會事業敗壞至於『日之歐美』，則欲收拾之而轉無從」（見『社會革命論』一文）。可見歐美資本主義的弊害，的確是無意識地（自然生長性的）造成的結果，爲民主革命時代沒有有計劃地發展社會經濟，「注意於社會事業」所致。

因此，社會革命在那裏，便不失爲一種治病的手術，而兩次革命論是病理的主張。病理學在患病的時候，固有其適用的價值，非它不可；但假如沒有病，便絲毫不能適用。否則，不獨無益，而且有害。這時，人所需要的，是如何講究衛生，以謀預防之道，換言之：只有生理學纔能適用。毛君以『辯證唯物論』作自己的宇宙觀，便應該曉得真理的時間性與空間性，不能濫用兩次革命論，使它在中國發生有害的結果。

因爲中國是一個資本主義沒有充分發達的國家，生產固很落後，階級分化亦不明顯。如孫先生所說：「只是患貧，不是患不均。在不均的社會，當然可用馬克思的辦法，提倡階級戰爭（即社會革命——非）去打平它；但在中國實業尚未發達的時候，馬克思階級戰爭，無產專制使用不着。……我們主張解決民生問題的方法，不是先提出一種毫不合時用的劇烈辦法，再等實業發達以求適用，是要用二

種患患預防的辦法，來阻止私人的大資本，防備將來社會貧富不均的大毛病」〔見「民生主義」第二講〕。這就是說：中國資本主義的階級尚未形成，不需要兩次革命論的兩期製，而只須實行一種生強學的主張，防病於未然就行了。

這有可能嗎？有。因為中國是一個後進國，當它剛由封建階段走上資本階段時，便有先進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弊害給它作榜樣，而社會主義者又提出了一改造的方案，使它明白：要預防資本主義的弊害，必須實行社會主義；要實行社會主義，必須發展大工業的生產力（生產問題）及廢除私有財產制（分配問題）。這種同時解決生產問題與分配問題最好的方法，就是「既發手工，乘機器，又統一而國治之」〔見「實業計劃」〕；換句話說：就是以計劃經濟的方式由國家來發展實業，只要做到這步，不僅可以「阻止私人的資本，防備將來社會貧富不均的大毛病」，〔見「』，而社會革命亦能迴歸於無形，和平地走向社會主義的境地。這正同我們自己未患瘧疾，患了，便依據生理學的辦法，特別講究衛生，以為患患預防一樣，很合人類理性的要求，當然可以辦到。

毛君不明乎此，既認中國為「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」，還要把馬克思的學說生吞活剝地拿來應用於中國，企圖在民主革命完成之後，「資本主義的發展，再來幹一次社會革命。這不僅無補於救國的」，是先提出一種毫不合時用的劇烈辦法，再等實業發達以求適用」，也正如

一個人在未患痲瘋的時候，不但不能預防，反要將病菌輸入體內，使它變成痲瘋，再來施行手術，以求治愈一樣，不是很可笑嗎。這種辦法，只要愚妄的瘋子纔能去做，通常有理性的人，是決不會如此的。可憐我們毛君，竟成這樣的瘋子！

爲什麼會這樣呢？第二個原因，就是他不知道三民主義理論的本質。

所謂三民主義，原是民族主義、民權主義、民生主義的總稱。歐美的歷史告訴我們：要建設一個文明康樂的國家，必須解決三大問題，纔能辦到。這三者，就是民族問題，民權問題，民生問題。它們三個國家之內，雖不必同時存在，却先後發生，有普遍的根本意義。如果沒有得到徹底的解決，就必然爆發成爲民族革命、政治革命、社會革命。歐美過去之有這些革命便是它們沒有解決的結果。因而一部人類的歷史，可說是這三種革命互相交織的紀錄。那時，各國解決的辦法，都是各別的，不相連貫，要分做幾次來幹。在理論上，可以叫做國家主義，民主主義，社會主義。孫先生研究歐洲歷史得出的結論是：「此三者之線相承，故須同時倡導三民主義」（見「華人精神教育」第三課三節）。

因此，在外國，從前要分做幾次來解決的問題，中國可以用「一勞永逸」的方式，「同時解決」（見「孫文遺教」第八章）。怎樣解決呢？就是以民生主義與民族主義、民權主義同時並行，舉民族革命、政治革命、社會革命，舉其功於一轍」（見「民權發刊詞」）便不致如歐美一樣，在第